



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

周飞战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教育部社科司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2YJA760099）



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

周飞战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 / 周飞战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5
ISBN978-7-5648-1415-1

I. ①女… II. ①周… III. ①女书—视觉艺术—研究 IV. ①H1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7617号

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

周飞战 著

责任编辑: 刘 霞 李 阳

责任校对: 胡晓军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 410081

电话: 0731. 88853867 88872751

传真: 0731. 88872636

网址: www.hunnu.edu.cn/press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648-1415-1

定 价: 45.00元

*著作权所有,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前 言

女书是妇女创造的、流传在湘桂边境的一种独特的女性语言文字，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唯一的女性文字。近年来，女书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之一，已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正在被有关专家组织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就有关于女书的记载。然而由于女书所在地的位置偏远、传承自闭，女书养在深闺，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发现，80年代才引起重视。女书文化是我国南方汉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研究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人类的发展历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本书主要从美术学、造型艺术的视角来研究女书文化，力求开辟对女书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丰富美术创作、艺术设计的内容。本书的研究内容辐射到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研究领域，虽有一定难度，但对女书文化的传播与研究有重要意义。

目前，中国女书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中国女书的学人已由早期的少数几人增至现在的近百人，已发表有关女书研究的论文300余篇，出版相关的专著30余种。这些成果，主要是从语言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妇女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民间文学等学科领域加以研究的。如涉及历史学、考古学的有谢志民的《江永女书之谜》、李荆林的《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涉及语言文字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有赵丽明的《中国女书集成》和《女书合集》，远藤织枝的《女书——中国的女性文字》，宫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等。不过，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对女书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却还处于初始阶段。虽然现有成果有部分内容涉及了女书艺术，但这些成果没有从视觉艺术专业的角度对女书文化进行系统的、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如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胡师正教授主持的“湖南江永女书的文学艺术特色研究”课题（2007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他是从文艺学理论的角度来诠释女书的，与书的研究方向不一样；湖北工业大学土建学院的段圣君教授2010年申报的湖北省人文社科项目课题“女书图案设计”，何红一、远藤织枝等学者有几篇论文，虽然对女书图案与设计的研究有所涉足，但均未做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女书与视觉艺术是女书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女书字符、女书书法与绘画、女书图案设计、女书图标、女书服饰、传统女书的女纸、女扇、女帕等已构成相对完整的女书视觉

文化体系，其内容丰富多彩，具有独树一帜的民族与地域特色，值得我们去挖掘。

本书想以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作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民间原生态文化资源，从地方性独特的女书文化中探讨艺术造型的特点与规律，研究女书与当代书法、美术、设计的创作实践的关系，同时亦使女书这一独特的民族文化“化石”得以传承、新生与发展。

女书文字是古越文字的遗留和演变，是南方古越人后裔民族（岭南一带瑶族）普遍使用的文字。女书文字的造型受楚文化的影响，在女书的装饰图案及风格中，还透露出不少古代楚、越文化的痕迹，如女书文字的长菱形结构与战国时期南楚一带的纺织品造型风格相仿，楚人这种菱形结构花纹及抽象符号，在现今江永一带及邻近地区的织物中仍能找到。女书在造型上轻盈飘逸、刚柔相济、昂扬俊俏，似与楚艺术风格不谋而合，造型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女书字符的造型与道教、巫术有关，湘南民间一直保留着民族生活中的原始遗风和古老习俗，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社会流行过的以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为形式的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顽强的承袭性，文化底蕴很深。

女书造型与原始的农业生产、稻作文化紧密相连。女书文字中那些象征不同生长阶段的稻子、稻作农业工具以及稻米食物的组合物之形造成的字符，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原始稻作文化有关。女书文字是一种与瑶族文化紧密相关的文种，它与瑶族历史文化有渊源关系，是湘桂边境瑶族妇女曾普遍使用的文字。

女书文化中蕴藏着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视觉文化体系，也是长江流域瑶族文明的标志。以女书文化与视觉艺术为课题，深入挖掘民间原生态文化资源，从地方性独特的女书文化中探讨视觉艺术的规律与特色，是抢救、保护和弘扬女书文化，亦是女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女书字符与图式、女红图案与工艺、瑶族服饰文化等共同构成女书文化的共融圈，形成独具一格的绿色文化长廊，它为造型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与内涵。其研究成果还能够应用于美术创作、艺术设计的实践之中，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女书资料收集整理困难，女书遗物散失严重，如今精通女书的几位老人也相继谢世，这一切都给研究女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代书法、美术、设计的创作还没有形成一个女书文化圈子，也没有给女书艺术提供丰富的视觉形态与图式。课题组成员为采集第一手资料，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多次深入江永、江华及桂北地区考察、专访，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并广泛地查阅了有关女书的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专业特点，确立了本项目的研究主题与内容。现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奉献给读者，权当是门外汉的话，看看无妨，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目录

001 第一章 女书与女书文化

- 002 第一节 关于女书
- 011 第二节 女书产生的文化背景
- 021 第三节 女书文化的独特性
- 026 第四节 女书文化的研究现状

033 第二章 女书文字的造型

- 034 第一节 女书的造字方法
- 043 第二节 女书字符的造型特点
- 049 第三节 女书字符与意象表达
- 053 第四节 女书字符的构成规律

059 第三章 女书文化与女红艺术

- 060 第一节 女书生活习俗与女红艺术
- 069 第二节 女书与女红图案
- 076 第三节 女书与“八角花”图案
- 081 第四节 女书文化与传统服饰艺术
- 087 第五节 女书文化与当代服饰艺术
- 094 第六节 女书文化与现代首饰艺术

099 第四章 女书文化与原始宗教艺术

- 101 第一节 女书文化与女神崇拜
- 110 第二节 女书文化与盘瓠崇拜
- 114 第三节 女书文化与鸟图腾艺术
- 124 第四节 女书文化与石神崇拜

129 第五章 女书文化与书法篆刻艺术

130 第一节 女书文化与书法艺术

152 第二节 女书书法的艺术性和美学品格

156 第三节 女书文化与篆刻艺术

165 第六章 女书文化与绘画艺术

166 第一节 女书文化与绘画概述

168 第二节 女书文化与永州盘瑶神像画

177 第三节 刘双全与女书绘画艺术

185 第四节 其他女书绘画艺术

187 第七章 女书文化与设计艺术

188 第一节 女书文化与平面设计

192 第二节 “三朝书”的装帧艺术

197 第三节 女书文化与陶瓷设计

202 第四节 女书文化与家具设计

208 附录

227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第一章 女书与女书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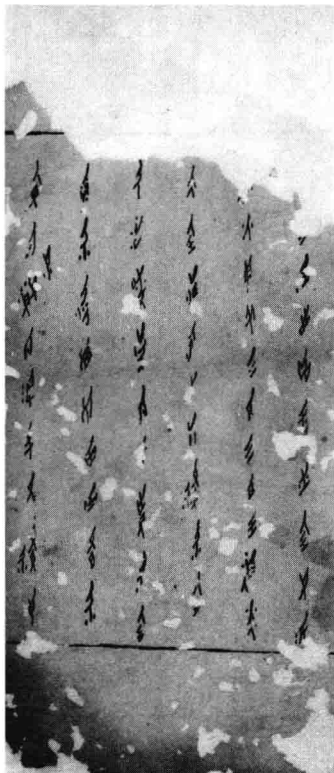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关于女书

一、关于女书

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存活、并仍在民间使用的女性文字。它是湘南、桂北地区由当地妇女创造、主要供妇女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女书主要流行在江永县东北部的潇江两岸，以上江圩镇为中心，遍及潇浦镇、允山镇、铜山岭农场、黄甲岭乡等地。女书流传范围东到江华瑶族自治县，南到桃川镇，西到千家峒瑶族乡，北到道县田广洞、雷福洞等村。下蒋乡、新车乡、清塘乡的一些村寨，也有女书的踪迹。在广西富川、钟山地区也发现过这种文字。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自制的手写本、扇面上，或刺绣在布帕上。写在纸张上的，叫做“纸文”；写在扇面上的，叫做“扇章”；写在手帕上的，叫做“帕书”；绣在布块上的，叫做“绣字”；织在被子、带子上的，叫做“字被”“字带”^[1]。

女书自流传以来，清末已转向衰落，作为一种书面交流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女书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义的语词，它记录的是当地的一种土话。女书行文自上而下，走行从右至左，通篇没有标点符号，造型秀丽娟细，其形体倾斜，呈斜长的菱形。它有书法美学范畴的气、韵、力、势、意、味、趣、神的艺术效果，风格飘逸、舒展。大多数研究女书的专家都认为女书有两类文字：一类是独创性的文字，独体字多，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借用与改造汉字而成，合体字多，结构复杂，数量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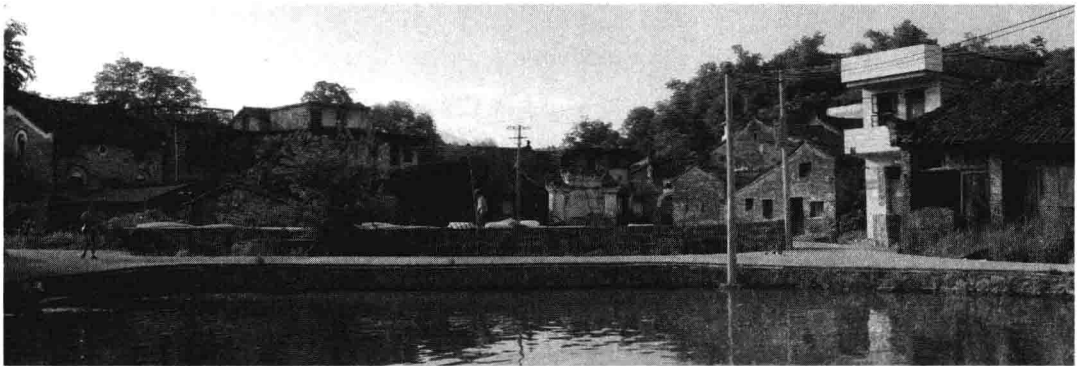


▲原生女书

[1] 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 永明女书[M]. 长沙：岳麓书社，1995.

女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而神奇的文字，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四种说法。即瑶姬造字、九斤姑娘造字、女妃造字、盘巧造字的传说（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瑶姬造字纯属虚构。女书学者宫哲兵认为后三个传说是指同一件事情，女书传人义年华认定盘巧是造字者。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出生时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最初用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女妃造字与盘巧造字，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女妃与盘巧，都是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山岭人，一个住荆田村，一个住桐口村，这两个村子紧挨着，仅隔一条河。她们的经历是相同的，都喜欢唱歌、女红、结交姐妹，都经历了远离家乡、亲人、姐妹的痛苦。她们的造字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纺织、女红图案造字，都要用土话去认字。

在女书最流行的上江圩乡，有许多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古老的村庄，许多姓氏都修有族谱。宫哲兵收集到唐氏、义氏等十多种族谱，最早的有宋代的，最晚的有清代中期木刻印刷的谱书。族谱中有大量的妇女民俗描写，还有很多诗词散文，但所有族谱中均无女书文字的记载。清嘉庆年间进士蒋云宽曾任刑部主事，辞官后回家乡江永县长居，收集了大量当地民风民俗，写成《近游杂缀》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了江永县妇女的生活、劳动、文化和家庭，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叹，然而却只字未提女书。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江永县的县志里记载了花山庙会的景象：“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在《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花山行》诗，诗中描述了花山妇女庙会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样两句：“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女书文字，但根据花山庙会的习俗，妇女们一边看着巾扇上用女书文字写的歌词，一边唱着嘹亮的颂歌。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才有了关于女书文字的确切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里记载的“蝇头细



▲古老的女书村落——锦江村

字”就是女书。女书写在纸扇上,这与光绪三十三年县志记载的“巾扇年年逢五月”是一致的。

1954年,江永文化馆的周硕沂在下乡指导农村文化活动时,从胡慈珠的手中搜集到了一些女书原件,后来又将这些资料寄到湖南省博物馆进行识别、鉴定,当时没有人能认出这种文字。

“文化大革命”之前,女书主人去世后,女书作品多作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很少的作为纪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间遗存极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女书作者担心自己用女书写的秘密会被识破,大量女书作品被销毁。同时,“破四旧”运动把这些神秘的文字当作“四旧”销毁不少。“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女性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女性之间使用汉语,不需要使用女书亦可交流,很少有妇女学习女书,女书开始濒临灭亡,只有少量女书作品得以保留下来。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教师宫哲兵(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在湖南江华、江永一带进行民族文化调查时,收集到一些女书材料、抄件及其录音片段,回校后他将这些材料交给本院严学窘(已故)教授鉴定。严老把这种文字推荐给本单位从事语言学教学和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谢志民老师进行鉴定。经研究,谢志民非常惊喜而又极其慎重地认定,这种瑶乡妇女使用的书写符号是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并向学术界宣布了这一发现。^[1]

1983年,宫哲兵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处理的调查报告》的文章,此后女书开始备受关注。同年,女书出现在美国第十六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当时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1984年,《文摘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分别报道了女书的发现。1986年3月,中国新闻社发布了湖南惊现女书的消息,8月新华社也做了相关报道,国内外各大媒体竞相转载,江永发现女书的消息便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此后,海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深入江永考察、学习、发掘。近年来,永州本地也积极实施抢救和保护女书文化工程,通过兴建女书文化村,建立女书博物馆,组织开发女书工艺品,发展女书文化产业,使女书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2010年,中国国家书画院副院长王田葵教授在对江永女书进行田野调查之后,创作出诗歌《庚寅初咏江永女书》。这首诗歌对女书作了诗意的小结与评价:

[1] 叶绪民,李庆福.女书文化的探索和破解[J].寻根,2001(4):5.

女书女字女人知，歌堂刺绣带织机。
翰墨同心写秀卷，梅花和泪作嫁衣。
一帕描活鸳鸯戏，三朝能引凤凰栖。
土音坐唱无丝管，巾幅诗书世所稀。^[1]

女书发祥地江永，历来为流寓迁徙之所，汇集了楚风瑶俗，儒、道、佛等多元素文化，民风淳朴。广大妇女既受宗法礼教禁锢，又过着相对自由且宽松的生活。由此，她们自主创造了这种女性文字，来相互交流，书写自己的生活情感和理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以此抗拒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制。女书与世界上其他文字相比较，它具有性别性、唯一性、独特性与历史的时限性（详见本章第三节）。

二、关于女书传人

女书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主要是通过妇女在家庭内一代传一代的传授方式进行传承的。女书大约传了多少代呢？我们采取由今及古的方式层层上推，以得出女书的大致时代。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桐口村义年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女书学习班，培养了几个 20 岁左右的女书传人，这些人如今也有 40 余岁了。同一时期蒲尾村的高银仙在家中教自己的孙女学习女书。她们的女书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代女书传人。代表人物有胡美月、义运娟、蒲丽娟、欧阳红艳、胡欣等。

胡美月，1963 年 3 月出生在蒲尾村女书世家，高银仙之孙女。胡美月从 5 岁即开始接触女书，10 岁时即初步会读、写、唱女书，13 岁时学会织带。2001 年到蒲尾村女书学堂担任教师，利用双休日为当地女性传习女书。创作有《胡美月诉苦书》《给曹小华三朝书》等。2003 年 10 月，她被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女书传人”荣誉称号。



▲女书传人胡美月

[1] 王田葵. 王阳之诗词墨迹 [M]. 香港: 中国文艺出版社, 2011: 72.

义运娟，系高银仙的孙媳妇。她于1989年开始接触女书，1998年跟三姐胡美月学习女书，基本掌握女书的写、读、唱，会绣、织等女红活动。创作了女书扇面《共赏奇文》等。2003年10月，她被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女书传人”荣誉称号。

女书传人再往前推一代，迄今还健在的代表人物当属何艳新、何静华与周惠娟了。



▲女书传人何艳新在写女书

何艳新，瑶族，1939年8月出生，铜山岭农场河渊村人。9岁时就跟外婆学会唱女歌，并初步知道女书的写、读、唱，对女红也有涉足。她写女书，仅是为不会写女书的吴良玉拿去打女书花带用，是“秘密”地在“幕后”写女书。当时她有五个小孩上学读书，丈夫患病，生活极其困难，无暇参与女书的访问谈话等活动。后来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她才可以有较多的精力，写写女书，接待来访的人。她去过北京，还去过日本，是个聪明开朗、见过世面的人。



▲女书传人何静华

何静华（又名何静花），1934年出生在江永县允山镇溪洲尾村。何静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女书环境熏陶，在耳濡目染中她学会了吟唱女书歌谣。何静华还在她们手中收藏到了三朝书的原件。20世纪60年代，何静华还跟母亲学会剪纸工艺，目前是附近几个村小有名气的女红能手，有“龙凤呈祥”“双凤朝阳”“龙仔凤女”等剪纸作品。1996年3月，小儿子因车祸不幸身亡，她把自己的悲痛用女书写成诉苦文《静华写书在扇上》，以慰藉心灵之痛。1994年，中央电视台到江永县拍摄电视专题片《深闺里的字谜》，何静华扮演“坐歌堂”婚俗故事中为女儿哭嫁的母亲，充分展示了她几十年的吟唱艺术。此后，何静华热爱女书、传承女书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在自己家里办起了“静华女书院”，为爱好女书的当地妇女义务传授女书，抄写女书原件唱本160多本，创作了《何氏修书诉可怜》《静华思逝儿》《十念亲娘》《我爱女书》《劝解歌》《思念之花》《十教儿女》《结交书》等50多部女书作品。2003年，何静华被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女书传人”荣誉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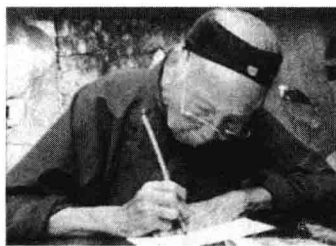


▲女书传人周惠娟

周惠娟，1943年4月出生于允山镇周家邦村，1961年嫁至夏湾村。周惠娟从6岁起跟随大姐学会唱女歌，10岁就有人请去当坐位女，参加坐歌堂等女书习俗活动，学会了许多歌堂歌曲。到夏湾村后，跟伯母（何福仙）学绣花、做衣服等女红10余载。1987年，美国学者史凯珊到江永考察女书时，把义年华接到上江圩镇政府翻译女书，当时由周惠娟翻译汉文，从此与女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期间，她还创作了《同师访女书》女书作品。2003年10月至12月，受宫哲兵之邀到武汉宜昌表演女书文化。江永女书园开园后，周惠娟成为第一批进入女书园工作的人员，直至2006年离开。现在，周惠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有关部门做女书的推广教育工作，创作女书作品有《周惠娟自传》《新疆之行》《祝寿》《兄妹情》《出行宜昌》《武汉之行》《上海之行》等。

20世纪70年代的胡慈珠，80年代的高银仙、义年华、唐宝珍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90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书传人是阳焕宜。另外，道县新车乡新车村的陈巨雄老太太也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这代传人的作品，没有人工雕琢的印迹，多属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

胡慈珠，1907年出生在上江圩镇浦尾村，后嫁至本镇葛覃村，享年70多岁。她童年就跟随奶奶（锦江村女）及同族姑妈胡绿德学唱老歌、学做女红、读写女书。是上江圩一带女书七姊妹中的大姐。1955年，江永县文化馆文化教员周硕沂到葛覃村开展文化辅导时，认识了胡慈珠。当天，胡慈珠就写了一篇女书给周硕沂，那篇女书就是著名的《女书之歌》。之后，周硕沂每次到葛覃村下乡做文化辅导，胡慈珠都力所能及地给他提供女书文本资料，使闺中秘字流向研究学者。周硕沂去新华区下乡都要到胡慈珠家抄写女书，胡慈珠将女书介绍给了周硕沂。胡慈珠创作、流传下来的女书作品主要有《女书之歌》《西静姊妹进花园》《胡慈珠自传》《慈珠劝解宝珍书》等。



▲女书传人高银仙

高银仙，1902年10月生于江永县上江圩镇高家村，1990

年2月去世，享年88岁。高银仙少女时代时常听老一辈妇女唱纸唱扇。20世纪60年代，高银仙与卢月玉、卢树宜、胡慈珠、高金月、欧阳三三、唐宝珍结为七姊妹，以书会友。红事时以女书为姊妹贺喜，白事时以女书为姊妹哀悼。二姐卢月玉去世时，高银仙写了悼词和一本女书《王氏女》作为卢的陪葬品。

高银仙晚年更倾情于女书，创作了大量女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她的已经出版的留世之作，有三朝书20余篇，自传和诉苦歌10余篇，婚嫁歌40余篇，民歌70余篇，谜语50余篇，翻译作品10余篇，书信10余篇，为抢救女书作出了巨大贡献。

义年华，1907年出生于江永县上江圩镇棠下村，1991年去世，享年84岁。她出生于官宦之家，曾祖父曾涉足官场，祖父义训朝虽未当过官，但有较高的文化，父亲义昔君，是独生子，母亲何光慈系潇浦镇白水村人，外祖父是清朝的秀才，义何两家是门当户对的书香门第。她幼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有小学文化。14岁时从白水回到棠下村以后，开始向婶娘学习女书，并迅速成为认、读和写作方面都有很高水平的女书传人。她写自传，还替别人写过许多传记、三朝书、民歌、记事歌、婚嫁歌、翻译作品及书信。1987年，义年华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于本村组织了一个女书学习班，为抢救女书作出了贡献。她去世时，其女书作品被当作祭品焚烧，现留下来的作品比高银仙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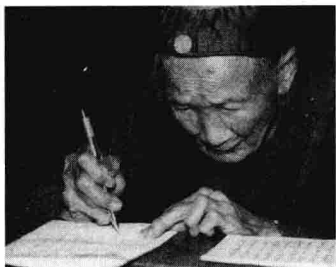
▲女书传人义年华



▲女书传人唐宝珍（左）、何西静（右）

唐宝珍，1910年生于上江圩镇夏湾村，1999年去世，享年89岁。唐宝珍是高银仙、胡慈珠等结拜七姊妹之一。幼年时期就会认女书，能写少量的女书字。并且，她有一副特别好的歌喉，当地流传的歌谣、女歌，她没有不会唱的；记性又好，别人编的歌，她听得一两遍便能记下来。她虽然不识汉字，但却能出口成章，编造新歌。她常在坐歌堂、斗牛、贺三朝等特定女书习俗活动中，带头唱女歌，教同伴们唱女歌，有“歌头”的美称。1982年，宫哲兵到江永调查女书时，她和高银仙在江永县城共同吟唱了3

本女书，供宫哲兵录音，她还创作了《唐宝珍传》《回胡慈珠书》等女书作品。



▲女书传人阳焕宜正在写女书

阳焕宜，1905年7月2日出生于江永县上江圩乡阳家村，于2004年9月22日去世，享年99岁。阳焕宜从小跟祖母李树了学医，特别长于诊治小儿麻疹。在行医时常常听到许多农村妇女谈及女书。阳焕宜十多岁时与同村的几个结拜姐妹到兴福村拜师学女书，经常帮人写一些女歌、三朝书。阳焕宜一生坎坷，在艰难的环境下，她把失去亲人的创伤和对幸福的向往，凝结在笔端，写女书，唱女书，聊以解闷和自娱。

1991年出席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1995年到北京参加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已是90岁高龄的阳焕宜在国际会议上写女书，唱女书。2003年10月，她被江永县女书文化研究管理中心授予“女书传人”荣誉称号。配合清华大学教授、女书研究专家赵丽明，于2004年1月编辑出版了《百岁老人——阳焕宜女书手稿》专著。为抢救保护女书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再往上推，由于女书人死书焚，至今几乎没有文字记载。女书传人是女书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了解她们的相关信息是研究女书文化的基础。



▲原生态女书传人

三、女书与女书文化

女书是一种集独特的文字符号、独特的作品内涵、独特的人文背景和独特的习俗活动等于一身的文化载体。一千多年来，女人用它来交流情感、传达信息，反映出她们的精神世界。早期的女书作品一般写在纸上、扇面上、三朝书上，而单个的女书字符、民谣被妇女们绣织在花带、手帕、花被上，这类女性手工纺织品被叫做“女红”。女书除了具备独特性、神秘性、野俗性和综合性等鲜明的个性特征之外，还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的非物质性、生态性和“活态”性特征。女字、女歌、女红和女性习俗活动等构成了立体而丰富的女书文化体系。女书是人类的文化珍宝，女书习俗是女书文化的核心和主体，是女书完整的、直接的形态，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女书文化是我国南方汉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为研究南方民族历史、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证据，它对研究人类文字和文明的起源、女性文化和民族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发展历程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关于女书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女书作为一种独特性别的文字，包括其字体的形态、语音、笔画结构、组合方式以及使用功能等；广义上的概念是指女书文化，包括产生这种文化的人文地理、女书流传区域的各种风俗习惯以及女书文字写成的作品。本课题研究的对象多是广义上的女书文化。同时有的地方从狭义上把独立的女书当做女书字符加以强调提出，概念更为清晰。

女书文化、作品就发生时间与原创性可分为三种类型：

1. 原生型。寡妇诉苦、姊妹结交等歌谣、传统女红作品。这类作品代表女书本体自身文化，具有一定封闭性。
2. 次生型。哭嫁、叙事、耍歌、民谣、祭祀、按照传统工艺新制的女红作品等。这类作品属于区域共享文化，具有相对开放性。
3. 再生型。根据原生型翻译改写的作品，是一种再创作。这是社会传统文化的移植，如现代女书舞蹈、影视作品等，具有大文化流通性。